

# 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及其政策启示

廖中举,余聪俐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完善的治理体系可有效提高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以往研究侧重剖析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存在的问题,但缺乏对治理经验的凝练,因此,选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方主流媒体的94篇报道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扎根理论提炼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研究发现: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由战略目标引领、制度体系构建、市场运行管理、技术人才支撑与治理效能评价5个部分构成,形成了动态的治理闭环。其中,战略目标引领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治理的方向,为整个体系提供顶层牵引;制度体系聚焦产权、配额、监管等基本规则设计,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运作奠定基础;市场运行管理涉及交易设计、金融创新、协同网络等多个环节,推动价格发现与资源环境要素高效流动;技术人才赋能依靠基础设施、技术标准与专业人才培养,给予资源环境要素市场支撑,保障规则落地与市场运行效率;治理效能评价则从环境、经济与制度3个方面衡量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成效,并反馈评估结果,驱动治理体系持续优化。未来,需进一步完善区域差异化的治理路径,促进市场化与行政手段的有效协同,并深化金融创新以激活资本效能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活力。

**关键词:**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治理经验;市场监管;碳排放权;制度效能

## 一、问题的提出

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经济学、环境学等学科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盘活利用存量资源”<sup>[1]</sup>。然而,受市场交易规则、产权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还存在市场

流动性不足、市场割裂、制度衔接失灵、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失衡等问题<sup>[2]</sup>。因此,如何加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成了理论与现实亟须解决的问题。

治理意味着转向更具互动性的行政管理,如联盟、伙伴关系或网络<sup>[3]</sup>。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意味着要通过建立、重新确认或改变制度安排来解决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冲突<sup>[4]</sup>。其中,“冲突”不是指两方或多方之间存在公开冲突,而是指资源环境要素市场

引用本文:廖中举,余聪俐.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及其政策启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3):143-15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101)

作者简介:廖中举(1985—),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生态创新研究。E-mail:16437ljz@163.com

化配置中不同利益不相容且无法同时满足的情况——必须选择巩固哪些利益、舍弃哪些利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平衡<sup>[5]</sup>。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环境治理”,当时生态危机的威胁迫在眉睫,政府为应对工业污染等凸显问题启动了监管工具<sup>[6]</sup>。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是一个多层级且协同演化的动态进程,涉及不同管辖层级的行动主体,并在行为体间的复杂互动中经历协同演化<sup>[7]</sup>。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与管理存在一定差异:管理涉及制定操作性决策,以实现特定的配置成效;治理指通过更广泛的机制和制度来影响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决策的过程<sup>[8]</sup>。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体系,是引导和规范相关主体参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行动与互动的框架<sup>[9]</sup>。在研究内容方面,由于资源环境要素在产权界定、交易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如何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体系成了重点。如谢花林等提出了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体系<sup>[10]</sup>,刘高峰等构建了一个应对流域治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五维治理框架<sup>[11]</sup>;基于市场交易与财产权相结合的视角,朱冰认为我国碳排放治理需要由“行政监管”向“市场与合作”的财产权统合模式转化<sup>[12]</sup>。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往研究多采用传统计量经济方法,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评估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如陈敏基于投入产出、驱动因素分解等方法,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水资源配置质量的区域和行业差异及其演化特征<sup>[13]</sup>;王兵等基于网络RAM模型和两期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不同治理模式下的水资源系统生产率<sup>[14]</sup>。二是评估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作用效果,如钟顺昌等评价了省域范围内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集中度、土地资源错配等对地区降碳效应的影响,并提出了加快推进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强化协同治理能力等建议<sup>[15-16]</sup>。

然而,尽管学者认识到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是一个复杂过程,但以往研究多是基于问题导向或计量视角,而从经验梳理的视角开展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研究偏

少,且鲜有学者将扎根研究、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纳入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研究领域。鉴于此,选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环境报》等官方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扎根理论提炼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本研究创新点在于:一是研究视角创新,以往研究多从问题剖析或计量视角出发,而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提炼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为理解复杂的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框架,填补了从经验梳理角度开展相关研究的空白;二是数据来源新颖,选取国家级和省级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深度挖掘并提炼了大量本土化、可操作的治理实践经验与模式,揭示了支撑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模式有效运行的关键驱动因素。

## 二、研究设计

### 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等提出的一种经典的质性研究方法,强调通过持续比较、迭代式编码及理论抽样,逐步提炼核心概念、范畴及其关系,直至达到理论饱和,最终从原始数据中自下而上生成扎根于经验数据的理论<sup>[17]</sup>。扎根理论能对非结构化质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系统性探索缺乏成熟理论框架的新兴社会现象,并通过三级编码提炼文本中的隐性关联,构建多因素间的作用路径<sup>[18]</sup>。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需要识别政策工具、市场机制、环境约束等多重关键因素及其互动关系,尚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治理模式,因此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相关新闻报道的文本进行系统性挖掘和编码,以自下而上建构契合本土实践的治理经验模型。

### 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环境报》及部分省级党委机关报(如《解放日报》《南方日报》《江西日报》等)作为资料来源。所选报纸均为国家级或省级官方主流媒体,是政府资源环境政策发布、解读与实践经验传播的核心平台,报道内容均经过严格审核,信息真实可靠,能有效反映国家及地方层面对资源环境要

素市场化配置的政策导向、实践探索和官方认可的治理经验<sup>[19]</sup>。选择“资源环境要素”“环境要素市场”“环境权益交易”“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为检索关键词,以2020年9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为检索时间范围,对上述选定报纸的电子数据库进行系统检索。

基于初步检索结果,按照以下标准逐篇筛选:第一,主题相关性。文本的核心内容必须明确涉及资源环境要素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实践、政策、管理措施、治理机制或相关讨论,排除仅涉及一般性环保工作、行政命令式配置、纯技术性描述或与市场化配置无关的报道。第二,内容完整性。优先选择深度报道、评论文章、政策解读、案例分析、经验总结类文本,排除简讯、消息发布或信息量过少的短文(如仅提及某市场成立而无具体运作或治理内容)。第三,政策有效性。确保报道内容反映该时段内有效的政策或实践,排除反映过时政策或已失效机制的报道。经过上述检索和筛选,最终收集94份相关报道文本,作为运用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并提炼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的有效样本。

### 三、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

运用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作为研究工具,执行规范化的三级编码程序,从原始文本数据中自下而上识别核心概念、构建范畴间的逻辑

关联,最终形成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模型。

#### 1. 编码过程

##### (1) 开放式编码

系统梳理并编码研究文本中与主题相关的句段,持续比对不同文本片段间的异同特征,不断调整并优化编码方案,最终形成138个初始概念和45个副范畴(表1)。

##### (2) 主轴编码

深入比较并分析初始概念与副范畴,基于语义关联性将内涵相似或逻辑相关的概念予以整合,最终形成政策目标锚定、产权制度设计、协同网络建设等17个主范畴(表2)。

##### (3) 选择性编码

系统梳理政策目标锚定、产权制度设计、配额管理体系、协同网络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等17个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基于持续对比与凝练,最终识别其中的核心关联结构,得出战略目标引领、制度体系构建、市场运行管理、技术人才赋能和治理效能评估5个核心范畴。根据王红帅等提出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框架,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需以系统化、协同性和效能导向为核心,强调制度体系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技术赋能支撑,并需紧密对接国家战略目标与治理效能评估<sup>[20]</sup>。鉴于此,基于扎根理论编码提炼的5个核心范畴,遵循“目标-机制-效能”的思路,构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模型(图1)。

表 1 开放式编码结果(部分)

| 副范畴    | 初始概念                                      |
|--------|-------------------------------------------|
| 产权界定登记 | 集体化确权登记、“三权分置”改革深化、资源资产产权能拓展、林地固碳功能资产化    |
| 产权纠纷处理 | 主体权责明晰、多元解纷机制、权属数据管理                      |
| 执法链条完善 | 违规行为界定、责任追究机制、执法服务下沉、司法执行创新               |
| 配额分配   | 明确分配原则、明确分配方式及比例、总量控制指标分解、系统赋能分配、灵活选择分配方法 |
| 形成交易价格 | 出台定价标准、市场化方式确定交易价格、浮动定价调控                 |
| 价值实现工具 | 农林经营权抵押、碳配额质押贷款、水权质押授贷款、排污权抵(质)押品         |
| 主体协同   | 个人碳金融模式、碳众筹机制、个人碳交易参与、分布式碳账户、金融机构协同、政银企联动 |
| 服务机构建设 | 建成一站式产权交易中心、指导企业碳交易管理、提供碳聚合服务、打造交易咨询机构    |
| 企业降本增收 | 配额出售获利、增加企业利润和收益、降低企业成本                   |

表 2 主轴编码结果

| 序号 | 主范畴    | 副范畴                           |
|----|--------|-------------------------------|
| 1  | 政策目标锚定 | 宏观战略导向、目标指标明确                 |
| 2  | 市场主体引导 | 企业激励、政策宣传                     |
| 3  | 公众意识塑造 | 理念培育、行为引导                     |
| 4  | 产权制度设计 | 产权界定登记、产权纠纷处理                 |
| 5  | 政策法律保障 | 立法体系构建、执法链条完善                 |
| 6  | 监管框架构建 | 监管手段创新、监管全面覆盖                 |
| 7  | 配额管理体系 | 总量控制、配额分配、配额清缴                |
| 8  | 交易市场设计 | 明确交易范围、优化交易流程、形成交易价格          |
| 9  | 金融工具创新 | 价值实现工具、市场深化工具、风险缓释工具          |
| 10 | 协同网络建设 | 部门协同、国际协同、区域协同、主体协同           |
| 11 | 市场风险调节 | 风险评估预警、弹性缓冲机制、配额回购与储备         |
| 12 | 基础设施支撑 | 服务机构建设、平台系统完善、智能设备辅助          |
| 13 | 技术标准建设 | 监测技术创新、核算方法完善、标准规范研制          |
| 14 | 专业人才培养 | 学科建设合作、人才引进补助、人才团队培养          |
| 15 | 环境效益   | 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污染减排与质量改善、资源节约与效率提升 |
| 16 | 经济效益   | 企业降本增收、生态资源增值、产业升级优化          |
| 17 | 制度效能   | 制度执行效果、制度创新效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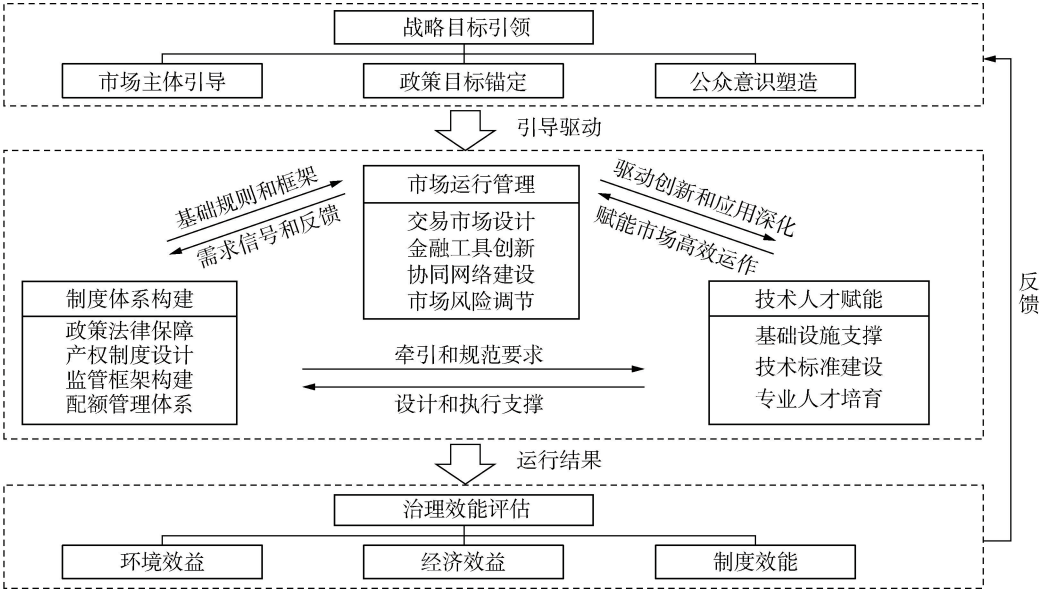


图 1 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模型

2. 编码结果分析

根据图 1 可知,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模型能系统体现“目标、规则、运行、支撑、效能、反馈优化”等要素的动态运行过程,即顶层目标经由政策法规转译成可执行的制度架构,促进市场交易和协同创新,依靠技术标准和人才保障其高效运转,并凭借效能评价体系将结果回馈到目标和规则层面,从而促使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体系不断演进。该模型根植于本土实践,结构上包含

了制度、结构、程序等资源环境治理的主要因素,目标上追求并兼顾了有效性、公平性、响应性与稳健性,机制上嵌入了以评估为基础的反馈循环,为我国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复杂治理体系提供了清晰的架构<sup>[21]</sup>。

(1)战略层:目标确立与顶层设计

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中,明确的战略引领是基础,将生态治理目标嵌入市场基础制度能为整个治理过程提供顶层牵引,从而有效地统筹发展和减排、局部和整体,实现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动态平衡。

①政策目标锚定。政策目标锚定属于战略层的首要环节,政府依照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综合考量减污、降碳、扩绿等目标,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了明确的宏观战略引领方向,并在关键环节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资源环境要素配置,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承载力相协调<sup>[22]</sup>。同时,政策目标锚定将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战略目标转化为可实施、量化的约束性指标和任务体系,确保目标有明确的执行路线、可追踪的动态监测体系和严格的考核评价准则。

②市场主体引导。市场主体引导属于战略目标向经济系统传导的重要环节,需确定在市场化治理中对企业的引导方向,并用激励政策、政策宣传等来推动企业参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此环节通过规制和经济手段调动企业参与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和主动减排的内在动力,并依靠技术升级扶持、专项基金、融资便利等措施助力企业发展,将碳排放权履约情况与资金申报挂钩,将政策压力转变为长效的市场驱动力<sup>[23]</sup>,同时依靠规则培训、政务平台发布交易指南等方式提高企业对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机制的认识度和接受度。

③公众意识塑造。公众意识的形成是战略目标向社会各方面的有效传达,培养社会公众的节能环保理念、提高整个社会对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认同感,进而提升政策执行的依从性,能为创新性的环境解决方案提供社会基础<sup>[24]</sup>。此环节主要引导公众将低碳行为转化为碳币等具备财产属性的数据权益载体,设计碳激励资金、碳币循环等激励机制,将个人行动同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机制联系起来<sup>[25]</sup>。

(2)运行层:制度体系、市场机制与技术人才的联动运行

①制度体系构建。完备的法律、政策与监管体系能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运作赋予基本规则,能对技术人才赋能产生需求引领,从而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赋予统一的制度支撑。针对产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确定资源环境要素的产权归属和权能,在统一平台上登记,为交易奠定法理基础,减少因权利不清而

造成的风险和交易成本,方便对资源环境要素的权属变更进行实时监控;针对产权纠纷处理机制,通过权属调查、统一登记、数据入库、跨域协调等手段,明确资源环境要素交易中各个主体的权利边界和责任,提高资源环境要素的交易效率。

从政策法律保障的角度而言,多层次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能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执法依据与政策支撑,依靠高层级法规来消除市场分割,从而为全国市场构筑起风险可控、公平竞争的基础,并构建闭环执法体系。从监管框架建立而言,要使监管手段趋于多样化并进行动态化创新,可借助区块链等技术来解决透明度低、数据不可信等难题,并推动社会监督,从而保证市场机制能够有效支持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的主要目标。实行全过程监管,涵盖确权登记、总量控制、交易、履约清缴等关键部分,加强对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平台、第三方服务机构及市场参与者行为的监督。

配额管理是对总量控制、配额初始分配、核查清缴的闭环管理,需结合行政规制和市场机制来平衡市场供需。配额管理需先设定刚性的约束指标,依托可交易许可制度来分配初始配额,核心思想是环境目标和市场效率并重<sup>[26]</sup>。再经由注册登记系统开展配额分配,需考量行业异质性、减排潜力、经济与社会影响等因素,采用基准法、历史排放法等科学的分配方法,综合运用行政指令性分配、市场拍卖、免费分配与有偿分配相融合的分配途径<sup>[27]</sup>。最后,配额清缴要促使责任主体按时足额清缴与其实际消耗或排放量相符合的配额,建立灵活履约机制。

②市场运行管理。市场是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主要场所,市场能否高效、透明、规范地运行,决定着资源环境要素的配置效率。资源环境要素的交易市场设计要确定市场边界,改善交易流程,建立动态定价机制,保证市场公开与高效。确定可交易的资源环境要素边界(包括要素种类、覆盖部门、技术类型和地域边界),统一标准消除市场分割,并扩大交易品种和主体。明确出让方式和标准化的交易程序,及时披露交易数据。市场设计的核心是形

成有效的定价机制,政府端设定价格底线,通过调整免费配额比例、实行豁免政策调节成本,市场端则由供需决定动态价格并实现政策协同,价格应能反映资源环境要素的稀缺性,并将环境成本信号传递给生产者,实现成本效益最优<sup>[28]</sup>。

金融工具创新方面,需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加强定价和风险对冲的功能,促进资源环境要素向绿色产业流动,运用保险产品分散绿色转型风险<sup>[29]</sup>。其中,价值实现工具将资源环境要素转变为具有流动性、可抵押、可交易的金融资产,用价格信号来实现高效配置和减排目标。市场深化工具涉及绿色债券、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通过标准化合约来扩大交易规模和市场深度,给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渠道。风险缓释工具涉及基于资源环境要素的保险产品,通过承担替代责任降低投资者的风险。

协同网络建设旨在整合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和国际主体,打破行政壁垒和资源孤岛,创建多层次、多主体、多区域联动的市场生态,从而加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透明度和韧性。部门协作要强化信息共享,破除行政壁垒,提高全国统一市场的运行效率。区域协同是依靠跨区域规则和技术协调来推进跨区域的生态补偿和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实现区域共治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创建。主体协同需多元主体参与,在决策过程中整合知识、协调利益、建立互信关系,降低政策的执行阻力<sup>[24]</sup>。国际协同是通过规则对接、标准互认搭建跨境合作平台,提高定价效率与国际附加值,增强全球气候治理合力。

市场风险调节要识别出波动风险并建立相应的应对措施,从而保障资源环境要素价格的稳定、维护参与者的利益。利用数据系统对资源环境要素市场进行监测发现其中存在的法律、操作、市场、信用等风险,实现动态预警。采用配额预支、配额租赁等弹性缓冲手段应对突发需求或短期的市场波动,从而达到调节市场风险、提高资源环境要素配置效率的目的<sup>[2,30]</sup>。政府设立配额回购储备机制,在市场低迷时期回购,价格过高时投放,这对于抵御市场失灵、规避价格异常波动及应对资源环境要素供需失

衡具有重要意义<sup>[30]</sup>。

③技术人才赋能。一是基础设施方面,创建专业服务机构,提供交易撮合、咨询、认证、风险管理等多方面的一站式服务;创建集成实时交易系统、区块链及数据分析功能的数字化平台,优化产权登记、交易、核算和监管流程,依靠智能匹配削减资源环境要素交易的成本,提高效率和透明度;智能监测设备需融合物联网等技术,提升资源环境要素的监测效率和数据精确度,为环境权益定价和交易提供支撑。二是技术标准建设方面,利用遥感技术建立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用精准的数据保证初始分配和权益交易的公平性,克服多要素计量成本高的难题,提高市场信任度;完善科学统一的核算方法,消除计量科学、会计实践、监管问责三者之间目标上的矛盾,给出可信的资源环境要素价值基准<sup>[31]</sup>;推进标准体系创建,为市场交易、权益流转及资源配置提供一致的准则。三是资源环境要素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同高校或研究机构合作创建交叉学科,塑造起“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的学科体系<sup>[32]</sup>;创立专项引进资金,引进精通定价、交易和市场机制设计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为提高治理效能赋予关键智力支持;开展常态化培训,培育专业队伍,以破解交易结构上的障碍,促进资源环境要素市场有效运转。

### (3)评估层:效能反馈与系统演进

针对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治理效能的评估同样不可缺少,即对市场化配置的效果进行全方位评价,主要涉及环境、经济、制度等方面。通过对改革效果进行衡量并反馈信息,促使治理体系从制度、结构、程序等各方面不断改进,确保资源环境要素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性和长期韧性<sup>[21]</sup>。

①环境效益。评价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治理的环境效益,涉及生态修复、污染减排、资源节约等方面效果。一是衡量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治理的生态修复和保护效果。实践中,流域生态质量总体好转,林业碳汇项目区域普遍完成林地土壤改良、林分质量改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依靠确定环境责任、整合产权和绩效激励,运用行政定价来激励地方政府增加生

态修复投资,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sup>[33]</sup>。二是评价污染物削减和环境质量改善情况。碳排放权、排污权等市场机制有效提高了治污效率,如上海市排污权交易和排污许可制改革之后空气质量优良率大幅提高,其主要通过设置排放上限并允许交易,保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使企业以边际减排成本为依据自主进行减排行为的调整,达到了全社会减排成本最小化的最终目标,大大改善了环境质量<sup>[26]</sup>;再以内蒙古阿拉善盟为例,通过水权交易盘活闲置水指标,较好解决了区域内水资源供需矛盾,提高了区域用水效率及发展水平,并通过能权、水权等要素市场赋予资源环境要素真实的成本信号,使资源使用者高效利用资源,并通过激励技术创新和促进要素的优化流转,提高整体资源利用效率<sup>[34]</sup>。

②经济效益。评估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治理的经济效益涉及企业降本增效、资源增值、产业升级等方面。一是评估通过资源环境要素交易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及其带来的新收入。企业可通过出售富余配额得到直接收益,利用市场的灵活性降低合规成本,避免因过度减排而造成边际控制成本大于边际损害成本的效率损失。二是将生态功能转化为经济价值。如宁夏盐池县用林权流转给村民带来分红,共享“资源变资产”的红利;福建厦门军营村将茶树固碳的碳汇交易收益转化为经济收益,实现村集体增收。碳汇交易将生态价值显性化、货币化,依靠区域财政补偿机制,为能源净流出地区提供可持续发展资金,推动乡村清洁能源建设,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sup>[35]</sup>。三是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变。试点地区以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要素的交易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比重降低,促进绿色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市场形成的价格信号促使企业投资低碳技术,推动企业改进生产工艺,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

③制度效能。评价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及创新性,确保制度落实到位。一是评价制度的执行情况。科学合理的配额管理制度设计保障了市场初期的有效供给,制造出适度的免费配

额短缺压力,促使企业建立控制目标并采取减排行动,通过交易机制将市场资金引导到减排潜力大的行业和企业。严格的监管与明确的规则使企业低碳发展的内在意识和行动意愿得到加强,将稀缺的资源环境要素集中到更具效率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区域,从而优化了宏观资源环境要素配置。二是评价制度的创新成效。碳普惠机制有效激发了全社会参与绿色减排的内生动力,提高了公众对相关活动的认识和参与度,扩大了治理的社会基础<sup>[25]</sup>;根据企业实际困难设计的配额预支、租赁等弹性缓冲机制保证了企业面对临时新增需求时的正常生产经营,提高了市场韧性<sup>[2]</sup>。制度创新解决了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痛点,提高了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效率。

(4)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模型的协同运作

战略层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引领地位,通过设定宏观政策目标、引导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并塑造社会公众的认知共识,同时承载了价值传递与行动动员的双重功能<sup>[36]</sup>。战略向制度转化时,顶层目标被拆解成可执行的约束性指标和任务清单,进而转化为产权确权、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及配额管理等基本制度安排,从而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规范性基础。战略层对市场主体参与意愿和社会公众行为的影响,会促使制度体系作出相应的调整:产权制度要具备灵活的确权能力,配额管理既要公平又要效率,监管框架应突出社会监督的功能,让制度设计既符合宏观政策目的,又得到各方面的响应<sup>[37]</sup>。战略向市场传导时,顶层目标经由总量控制、价格信号、风险调节等机制为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市场的高效运转划定总量限制和价格底线;资源环境要素市场运作时产生的需求信号和价格发现,又会反过来检验战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战略层对技术能力和人才储备的要求,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标准的制定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立,战略目标中有关低碳转型与数字化治理的前瞻性判断决定着技术支撑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投入强度,技术人才的实践创新和相关标准的不断完善又给战略目标的实



现提供更加可行的路径和工具。

在运行层内部,基础规则框架为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运作机制赋予了合法性根基和行为范围,依靠确权登记、法律保障、监管闭环与配额总量把控,确定交易标的、参与主体资格及合规要求,进而降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而市场运作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价格信号、供需波动、履约缺口和主体行为反馈,又会促使基础规则框架做出相应调整,如改良配额分配方法、完善监管手段、修订法律条款等。能力支撑体系是基础规则和市场运行之间的桥梁,为规则执行提供计量、核证、监测工具等,使制度设计可转化为可执行的流程,也可作为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交易提供高效的交易平台、可信的数据基础及专业的人才服务,保证市场定价和资源环境要素配置的效率。基础规则框架用技术标准、资质要求与人才培养激励规则,为能力支撑体系提供制度保障和规范引导,而在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市场运行中出现的复杂交易需求和技术难题则又促使基础设施升级、加快技术标准更新并推动复合型人才培养。因此,运行层可作为有机整体来实现战略目标。

运行层中的基础规则、市场机制和能力支撑三者之间协同运作,产生出环境质量、经济成本收益和制度执行有关的治理结果,评估层对这些运行结果加以评判,以此衡量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目标达成度。评估层对战略层的反馈和协同,形成了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模型由实践结果到目标优化的闭环。评估结果验证了既有战略目标设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为制度设计的持续改进提供了关键反馈。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制度效能的评价结果,可识别出配额分配是否合理、监管手段是否有效、金融工具是否适配等问题,而这些信息反馈至战略层后,依靠不断的双向反馈循环,使顶层目标由宏观导向逐渐转变为可操作性更强的阶段性任务。反馈结果也会传导至制度体系与市场运行层面,引导产权界定、交易规则、风险调节机制等的迭代优化。因此,协同机制使战略目标随着治理实践的推进而不断调整和完善,保证顶层方向始终和运行层的实际能力、治理需

求等相适应,进而推动整个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体系在良性循环中不断完善。

## 四、结论与讨论

###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以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文本为研究对象,从中提炼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模型,为理解复杂的治理体系提供了清晰框架:

其一,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治理的实践路径是以战略目标的确定和共识的凝聚为起点。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约束性指标,嵌入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同步引导市场主体,培育公众意识,调动企业积极性,构筑起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根基。战略层依靠目标分解、主体动员与共识凝聚来确定资源环境要素产权界定、配额管理等环节的价值取向,明确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管理的总量约束与价格底线,引领基础设施、标准创建与人才培育等方面的发展,使宏观战略真正融入运行层的各种治理活动。

其二,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治理目标的达成,依靠的是制度体系、市场运作和技术人才支持所形成的协同机制。制度体系以产权界定、法律保障、监管框架和配额管理奠定基本规则,从而降低资源环境要素的交易成本;市场运行管理依靠交易设计、金融创新、协同网络及风险调节,促使资源环境要素的价格被发现并实现高效流动;技术人才赋能依靠服务平台、数字设施、统一标准和专业队伍来保证规则的落实与市场效率。三者之间的动态联动表现为:制度体系给资源环境要素市场运行赋予了合法性根基和行为界限,市场运行带来的价格信号、供需波动与履约反馈则促使制度体系开展动态改良;制度体系凭借划定技术标准和技术人才激励规则,为技术人才赋能提供制度支撑和规范引领,技术人才赋能则为制度执行赋予计量、核证与监测工具;资源环境要素市场运行出现的繁杂交易需求和技术难题,促使基础设施升级、技术标准更新和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力支撑体系依靠高效的交易平台、可信的数据支撑和专业的人才服务,改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运作的



效率和韧性。运行层产生的环境质量变化、经济成本收益及制度执行效果,构成了向评估层输出的核心治理结果。

其三,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治理路径的动态优化根植于系统的效能评估与反馈。应综合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制度效能 3 个方面评价治理的成效。检验战略目标的达成情况及制度规则是否有效,把评价结果反馈到战略层,推动战略目标动态改进,促使制度体系就评价结果所显现的问题,展开产权界定、配额分配或监管手段的调整,引导资源环境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在金融工具、风险调节等各方面的迭代革新,从而塑造一个目标明确、机制完备、支撑有力、依靠效能反馈不断优化的现代化治理闭环<sup>[20]</sup>。

2. 研究启示

第一,完善区域差异化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路径设计。战略目标引领同制度体系创建之间存在密切的传导联系,但是就具体的落实情况而言,各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状况、产业结构及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别,这意味着从战略目标向制度体系的转化过程中应注重差异化设计。未来,相关治理要依靠地方实践经验创建“国家框架+地方细则”的弹性政策体系,给地方留出产权界定方式、配额分配比例、交易品种选择等方面的调整余地<sup>[38]</sup>,在保证全国统一市场制度协调性的同时,亦能调动地方按照实际情况创新治理工具的积极性。

第二,促进市场化手段和行政手段有效协同。制度体系创建同市场运行管理存在协同之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不是完全取代行政调控,而是形成以市场机制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协同模式。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刚起步阶段,可利用行政手段划定配额总量,规范交易程序培养市场信心,在市场成熟之后再慢慢削减直接干预,转而运用价格信号和金融工具来引导资源的流动,如面对突发的环境风险,可启动行政储备调节机制来稳定市场。

第三,深化金融创新以激活资本效能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活力。市场运行管理的加深要依靠金融工具的更新支持,而我国资源环境要素衍生品市场刚刚起步,产品种类较少,开放程度不高,尚未形成规模化、规范化的交易体

系<sup>[29]</sup>。未来要加快开发碳金融衍生品市场,推进碳期货、碳期权等产品的创新,为市场主体提供价格发现与风险对冲的手段,加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深度和稳定程度。与此同时,要创新差异化的金融工具,对中小企业推出配额质押加信用增信的金融产品,对公众推出个人碳账户金融功能,针对林业碳汇等长期项目,试点碳汇收益证券化以吸引社会资本。

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两方面不足,需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对模型反馈机制缺乏深入的剖析。研究样本主要依靠官方主流媒体报道,虽权威可信,但更多地关注了政策导向和成功经验,对实践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冲突和负面案例的覆盖可能有所欠缺。目前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模型只展示了正向优化路径,对负面反馈怎样引发战略调整、制度改进和市场更新则未深入探讨。此外,本研究未系统性呈现效能评估结果如何触发、影响和指导后续的政策修订、制度调整或规则优化。未来还可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政策文件、企业报告等多种数据来源,获得更加全面、立体的信息,用政策过程追踪分析的方法研究从效能评价到政策优化的微观传导机制。另一方面,缺乏治理模型的区域实证检验。本研究主要通过扎根研究和理论提炼得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模型,但尚未对模型在典型区域中的适用性与作用路径进行实证检验。未来可选择碳排放权交易、水权改革等典型区域,运用面板数据或准自然实验等方法检验模型的内在关系,以得出更具现实解释力的政策启示。

参考文献:

[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  
五年规划纲要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6:  
57-58.  
[ 2 ] 任玥,陈刚,王琪,等. 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的  
进展与挑战[ J ]. 中国环境管理, 2024, 16( 5 ):  
7-12.  
[ 3 ] 余少祥. 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维度与科  
学体系[ J ]. 浙江学刊, 2025( 2 ): 21-30.  
[ 4 ] PAAVOLA J.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reconceptualization [ J ]. Ecological

- Economics,2007,63:93-103.
- [ 5 ] PAAVOLA J. Multi-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ploring the economic explanations[ J ].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2016,26(3):143-154.
- [ 6 ] DURANT R F,CHUN Y P,KIM B,et al. Toward a new governance paradigm for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 J ]. Administration & Society,2004,35(6):643-682.
- [ 7 ] VAN ASSCHE K, BEUNEN R, DUINEVELD M. Formal/informal dialectics and the self-transform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s: an exploration[ J ].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14, 46 (6):654-683.
- [ 8 ] ARMITAGE D, DE LOË R, PLUMMER 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practice [ J ]. Conservation Letters, 2012,5:245-255.
- [ 9 ] PAHL-WOSTL C.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adaptive capacity and multi-level learning processes in resource governance regimes [ J ].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9,19:354-365.
- [ 10 ] 谢花林,罗世龙,陈倩茹. 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体系探讨[ J ]. 自然资源学报, 2024,39(11):2554-2569.
- [ 11 ] 刘高峰,徐智礼,李佳静.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水价值重构与流域治理框架研究[ J ].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6(6): 80-90.
- [ 12 ] 朱冰. 财产视角下的碳排放治理:气候法学的权利构造[ J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 34 (9):1-9.
- [ 13 ] 陈敏.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配置质量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J ]. 资源科学,2022,44(6):1280-1291.
- [ 14 ] 王兵,祝葶,杜敏哲. 治理模式差异视角下的城市水资源系统全要素生产率[ J ]. 资源科学,2021, 43(4):813-822.
- [ 15 ] 钟顺昌,汪文竹,闫程莉. 碳减排目标下中国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响应研究[ J ]. 自然资源学报,2023,38(7):1896-1918.
- [ 16 ] 张兵,余一辰,邹晨. 低碳城市试点对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J ]. 水利经济,2024, 42(3):1-7.
- [ 17 ] GLASER B G,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 M ]. New York:Routledge,2017:1-20.
- [ 18 ] 贾哲敏. 扎根理论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方法与实践[ J ]. 中国行政管理,2015(3):90-95.
- [ 19 ] 黄河,刘琳琳. 论传统主流媒体对环境议题的建构——以《人民日报》2003年至2012年的环境报道为例[ J ].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10): 53-65.
- [ 20 ] 王红帅,董战峰.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特征、推进思路 and 关键任务[ J ]. 改革,2023(12):138-150.
- [ 21 ] BENNETT N J, SATTERFIELD 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 practical framework to guide desig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 J ]. Conservation Letters, 2018:e12600.
- [ 22 ] 张友国. 中国环境治理现代化历程及其经济学逻辑[ J ]. 东南学术,2024(6):113-127.
- [ 23 ] SHEN W. Chinese business at the dawn of its domestic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incentives and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in carbon trading [ J ]. Climate Policy,2015,15(3):339-354.
- [ 24 ] NEWIG J, CHALLIES E, JAGER N W, et al.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participator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 framework of causal mechanisms [ J ].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18, 46 (2):269-297.
- [ 25 ] 黄秀蓉,栗静宜. 基于碳普惠探索的减碳权益属性研究[ J ].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2(5):90-103.
- [ 26 ] KEOHANE N O. Cap and trade, rehabilitated: using tradable permits to control US greenhouse gases[ J ].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2009,3(1):42-62.
- [ 27 ] JIN Y N, LIU X R, CHEN X, et al. Allowance allocation matters in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 J ]. Energy Economics, 2020, 92:105012.
- [ 28 ] CARMONA R, FEHR M, HINZ J, et al. Market design for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 [ J ]. Siam Review,2010,52(3):403-452.
- [ 29 ] 王勃. 绿色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J ]. 贵州社会科学,2024(8):134-140.
- [ 30 ] 詹诗渊. 碳排放权市场的规范性构建[ J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33(8):62-68.
- [ 31 ] BOWEN F, WITTNEBEN B. Carbon accounting: negotiating accuracy, consistency and certainty across organisational fields[ J ].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2011,24(8):1022-1036.
- [ 32 ] 陈超凡,周丽群,周杰. 系统观念下高校服务“双

碳”目标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J]. 广西社会科学, 2024(2):154-163.

[33] CHEN Y, DOU S Q, XU D Y.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compens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 hybrid of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1, 280:111840.

[34] ZHANG H Q, ZHOU Q, ZHANG C J.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water-saving effects in the context of water rights trading: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s water rights pilot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313:127725.

[35] 陆培丽, 彭兰凌, 沈嘉琪, 等. 实现共同富裕的创  
新手段: 碳转移支付[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2, 37(8):1132-1142.

[36] SHENG R.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gration: a content analysis of regional and urban nested hierarchies in China[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21, 31(4):283-301.

[37] OSTROM E.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3):641-672.

[38] 欧阳恩钱. 系统论法学下环境法的整体系统观及其实现路径[J]. 法治研究, 2025(4):105-118.

**Governance Experience from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 LIAO Zhongju, YU Cong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 sound governanc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problems in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but lack a summary of governance experience. Ninety-four reports from media such as the *People’s Daily* and the *Guangming Daily* a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the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is extracted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consists of five parts: strategic goal guidance, institu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market oper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d talent empowerment,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forming a dynamic governance loop. Among them, strategic goals lead the direction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and governanc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providing top-level guidance for the entire system.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focuses on the design of basic rules such as property rights, quotas, and supervisio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arket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Market operation management involves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transaction desig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networks, promoting efficient flow of price discovery and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Technology and talent empowerment relies on infrastructur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to provide market support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les and market operation efficiency. The evaluation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measu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from the aspect of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ystem, and provides feedback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o driv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governance path of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promote effec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marketiz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means, and deepen financial innovation to activate the market vitality of capital efficiency and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Key words:**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governance experience; market regulation; carbon emission rights;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